

对于专利、商标、版权“三分开”，知识产权局代表说出了心里话—— 企业要维权，“衙门”特别多

本报记者 盛利

■两会视点

“专利保护要到知识产权局，商标保护要到工商局，版权保护要到新闻出版局。但侵权行为往往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分得这么细。”江苏省知识产权局纪检组组长丁荣余代表说，“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比较分散，行政管理成本较高，企业维权也有难度。”

在丁荣余看来，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是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条腿走路”，“行政保护因高效、便捷、协调性强，可以解决大量的知

识产权纠纷。这在各国都是重要的保护手段。不过，当前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最主要问题是机构职能设置不合理，专利、商标、版权的管理职能分散于多个部门，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体系。”

“从全球来看，绝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相对集中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丁荣余说，“我国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但从创新体系来说，它的基本制度作用还没有有效发挥。”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代表说，在制度层面，我国知识产权相关的法规已经基本

形成，包括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为主体的法律体系；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植物新品种保护等管理规章、条例为辅助的国家层面的保护体系；地方省市制定了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基本框架制度已经形成，在政策框架制度方面，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是相一致的。

“从管理体系方面，我国采取知识产权保护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双轨制，各种知识产权门类分工管理及从中央到地方分层管理三大类管理体系。各国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都有其发展的背景和诞生历史。我国知识产权管

理的细化分工，与我国科技创业事业发展特点密不可分。与技术有关的专利，过去由国家科委专利局管理，在1998年机构改革中将该项职权划给现在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管理，而商标、版权则一直由工商、出版部门管理，自然形成这种细化的管理体系。”何志敏说，从国际上看，采取“三合一”管理体系的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约50%的国家；其中将专利和商标等工业知识产权“两合一”的国家，占剩下“分治”国家的绝大多数。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呼吁知识产权管理

的“三合一”，但实现跨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聚合难度可想而知。丁荣余说：“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当前，发挥知识产权作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必须尽快解决制约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2014年9月26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知识产权局揭牌成立，将专利、商标、版权“三合一”管理。对此何志敏评价，“上海浦东新区‘三合一’是与国际接轨，非常有益的尝试。”

全国第一个独立的、具有完整管理职能的

知识产权局的建立，源于上海自贸区的“破冰”：2013年9月国务院批准的《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提出，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执法体系，在知识产权管理领域，实现高效监管；2014年8月实施的《自贸区条例》进一步提出，在自贸区内探索知识产权统一管理的机制体制。新组建的知识产权局是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下属的第八个机构，今后还将进一步拓展公共服务职能，并探索纠纷多元化解、行政保护联动等配套机制。

丁荣余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调查难、取证难是普遍现象。一家企业的实用新型专利被仿制，自己很难调查取证。这就需要把侵权情况告知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但在工业领域，侵权事件往往不仅是专利单方面侵权，还可能涉及商标、版权等领域，这就需要统一的机构管理，统一受理侵权投诉。”在何志敏看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知识产权工作的着力点，是进一步加快研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工作体系。（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 “创新驱动一定会孕育新的增长动力”

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记者房琳琳）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对全年经济走势“信心不减”，“创新驱动一定会孕育新的增长动力”。

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4%。徐绍史认为，7.4%的增长在目前

世界各国当中名列前茅，而且经济的增量比较大，增长的质量也有所提升，“成绩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

但有媒体记者提出，今年一月份宏观经济指标走低的现象让人担忧。对此，徐绍史用三句话概括对2015年全年经济走势的预测——压力不小、利好不少、信心不减。在阐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有利条件时，徐绍史将“创新驱动”作为新的增长动力加以阐述。一方面，国内

企业对转型升级的渴望不断提升，环境约束企业的技术创新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创新也在积极探索之中。比如购买服务、股权合作、共同投资等政府与社会投资的合作模式越来越丰富，其中比较受关注的PPP合作方式，发改委已经下发指导性文件包括合同范本，有关省份正在组织积极学习。

徐绍史说，中国民众应该对我国经济保持信心。国家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根据新形势做出全面部署，在未来发展中，希望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综合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极；一带一路、环渤海京津冀等地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带。

■两会话题

发改委老主任对话“一桶油”

本报记者 张佳星

“提出的方案达成一致，可最后还是挡在你们‘两桶油’身上。”3月5日，经济界小组讨论会上，讲起在发改委任职主任期间办复的一件提案时，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委员挥了挥手，向坐在他右侧不远处的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委员示意了一下。

这引来傅成玉的插话，“企业是企业，怎么能挡得住政府呢？”

这一幕之前，解振华讲述了这件油品添加剂问题提案的办复过程，“一位来自兰州的委员，连续几年都提到了这个提案。我们就把相关部门请来一起讨论，到地方调研，提出的方案也达成一致了，可到了具体落实阶段却没能彻底解决问题”。

“企业不可以这样的嘛，企业利益大得过国家利益吗？”傅成玉快语接道，“政府就要敢作为。”

“你说的是对的。”解振华正面回应，“最好是几方坐在一起，就一个问题商量透了，解决是关键。”

等待发言期间，傅成玉一直探着身子、隔着中间一位委员，将目光集中到发言的解振华身上。

“现在的问题太复杂了。”傅成玉说，“复杂之一就是不同部门分阶段管同一件事。”

略作沉思，傅成玉提出柴油标准升级的例子，“从三到国四，环保部没意见，发改委没意见、工信部没意见，但对哪一天能实

现的理解不一致。环保部最严，给了必须实现的期限。”

“但是石油公司方面，上百家炼油公司的设备要改造，制造厂加工设备需要周期，在期限内造不出来”，傅成玉解释，“有些还要和厂家订货，排到一两年后，这方面发改委、工信部能理解。”

由此，傅成玉认为，争议出现在过程中，“（国四）标准没争议，日期有争议，争议在具体事情上，因此需要协商。”

听完傅成玉的解释，解振华没有直接反驳。他转而言道，“我特别赞同双周协商会。会上各种意见交锋，大家商量怎么解决。可能座谈会没有结论，但参加了之后，至少知道回去之后应该往哪使劲了。”

“解决方案要达到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提意见也不能泛泛地提”，解振华认为，政协的协商监督要“见实效”。

（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

环境保护：立法“强势”难改执法“弱势”

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记者王飞）在5日下午的政协小组讨论上，新《环境保护法》成了委员热议的话题。面对被认为是史上最严格、“长了牙齿”的新法，自称一名“老环保”，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王小康委员认为，我国之前的环保执法一直较为弱势，目前的新法执行情况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王小康表示，过去环保部门在执法中存

在一定困难，当然也不排除腐败以及人情等问题，使得环保法的执行不尽如人意。新环保法实施后，同样也要面临以上问题，因此从立法到落实并不是个简单的过程，也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努力。

在3月2日环境保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强调，“两高”环境犯罪司法解释出台至今，仍有八九个省区没有

查处一起环境犯罪案件，这些地方实际上都存在比较严重的环境违法现象。

“现在新法的实施使得环保部门相对强势，但环保执法要在一年内在发生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环保问题非常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王小康坦言，“搞环保工作几十年，我的体会是不能放弃发展搞环保。”在他看来，虽然新环保法赋予环保部门更多权力，如新增“按日计罚”制度、行政拘留等措施，但这些权力如何拿捏“度”，还要看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考验政府执政智慧。

很愿意对媒体传达关于“海洋碳循环”特别是陆海碳排放统筹科研工作的作用和意义。

“河流排污导致海洋富营养化、赤潮甚至绿潮等生态灾害，如果能在大数据基础上，将海洋碳循环计算出来，就能计算出碳排放成本，生态补偿就有了标准，不会像以前那样进行‘拍脑袋’式的或者不可持续的补偿。”

“大数据的搜集和汇总工作，是制定具体指标的前提。”焦念志介绍，目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承建了一些碳汇监测站，用于开展这项工作，“他们的碳汇检测在国际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海洋兰炭”：把海洋碳循环机制弄清楚

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记者房琳琳）“没有大数据基础和科学指标，就无法进行‘碳交易’，生态补偿机制也就不能科学有效运行。”中科院院士、焦念志代表在回答科技日报提问时说，他正在参与组织的海洋兰炭计划“就是要将海洋碳循环的过程机制探清楚”。

3月5日上午，总理工作报告结束后，焦念志在人民大会堂一楼被记者团团围住，直到成为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大代表，他是海洋兰炭计划工作组的主席。

焦念志介绍，“海洋兰炭计划是一个多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甚至跨时空的大计划，每个学科都有创新点”。该计划由国际海洋科学研究委员会“微型生物碳泵”科学工作组 SCOR-WG134 组织开展。美国科学家指出，该工作组提出的“微型生物碳泵”理论展示了海洋在二氧化碳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巨大潜力，同时也适用于陆地碳循环。

“减少碳排放成为约束经济的重要因素，但没有发展也是不行的。”焦念志

潘建伟委员：科研评审应多请国际同行

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记者王飞）记者在全国两会驻地见到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大学教授潘建伟委员时，这位国际知名的量子通信科学家衣着朴素，略显腼腆，但谈及到科研项目专家评审这样的专业话题时，他似乎马上开启了“演讲”模式。

谈到科研项目专家评审中的回避制度时，潘建伟指出，这项制度的出发点很好，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漏洞，应该加以完善，形成并执行“最严格的回避制度”。他举例说：“有一个情况特别值得注意，就是这个项目里有你的学生，你回避了；其他项目里有其他评审专家是你的学生，他也回避了；但你们却在互相支持对方的学生，这样一来，回避制度就形同虚设了。碰到这种情况，评审专家应该退出所有的项目评审，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

潘建伟曾长期在海外求学多年，他对国外项目评审邀请国际同行评审的做法十分赞同。“英

国最近有个量子通信的项目评审，邀请的全部是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做评审，没有邀请一个英国国内的专家，这样做就是为了确保评审的公平和公正。”

潘建伟认为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目前我国的科研项目专家评审多以国内专家为主，有时就出现了有人既当评审专家又参加项目申请的情况，这就很难保证公平的评审。在一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项目评审中，不妨可以多请一些国外专家参与评审。这样既可以体现评审项目的高质量，也可以避免一些评审不公现象。”

领域将进入混合所有制能够“试水”的范畴，“具体实施方式正在探索中。”

“急需投资领域、扶贫战略领域、环境治理领域都需要动员社会资金一起来做。”朱光耀强调具体实施中，要让企业看到项目的意义，增加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在项目的早期评估和准备过程中，政府监管首先要做到政策透明，项目本身也要透明，同时做好项目普及工作，增加信息透明度。”

朱光耀委员：国企不能再垄断基础设施投资

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记者张佳星）“这4776亿和动员社会资金紧密结合，实际上是在部署创新投资方式。”3月5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4776亿元，但政府不唱“独角戏”。

“国有企业不能再垄断基础设施投资，私有企业也要勇于创新、积极参与。”朱光耀说，创新投资方式中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共同发展”。

“比起上万亿的投资，中央预算内是个小数目，但起大作用。”朱光耀介绍，基础设施



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内领取政府工作报告后抓紧阅读。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两会声音

机器人产业急需“中国造”

本报记者 刘晓莹

“2013年我国市场共销售约3.7万台工业机器人，其中进口数量占近2.7万台，约占3/4的市场份额。”在5日下午的两会小组讨论会上，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徐晓兰委员话音未落，一旁的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柳崇禧委员便表示：“我们的生产线每年都会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招标过来的都是ABB、安川、库卡等国外的品牌，很少有自己的品牌机器人。”

“目前我国的产能越来越大，劳动力红

利也在逐渐消失，机器人无疑是最好的替代方案，而以机器人为主的智能制造是未来工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然而目前我们的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技术基础相对薄弱。”柳崇禧说，“我们要发展‘中国制造2025’，必须大力发展自主机器人产业。”

徐晓兰介绍，我国机器人领域的瓶颈技术主要体现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核心零部件、灵巧操作、感知等核心单元，以及系统集成设计应用这三个方面。“这需要通过一

些顶层设计来布局前瞻性战略研究，做好行业引导。”她同时表示，我们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的差异化机器人发展道路。“目前世界上至少有48个国家正在发展机器人，德国主要发展工业机器人；日韩主要发展服务机器人，如家政、医疗、康复机器人等；而美国的特种机器人最为先进，比如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徐晓兰说，“发展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

李毅中委员：“涨工资”少不了机器人

本报记者 张佳星

“大家都希望涨工资，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3月5日，政协小组会议间隙，在被问及工业机器人、家政机器人的前景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说，“在不能靠大量人工、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的时候，只有用机器人换人，提高他们的劳动质量；另一方面，促进了转岗培训，提

还能进入家政等各种服务业领域。”李毅中对机器人服务的的评价是，“有效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对于可能会产生过剩劳动力的忧虑，李毅中表示并不是坏事，“富裕的劳动力对在岗人员形成了竞争机制，提高他们的劳动质量；另一方面，促进了转岗培训，提

高劳动力本身的素质，进而从事更高级的劳动。”

“它属于智能制造的范畴，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李毅中解释，广义上讲是数控机床，狭义地说是机器人、机械手，“它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机械制造融合的结果。”

“机器人使用的直接效果是提高劳动效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拿什么创造价值来涨工资呢？”李毅中说。（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

代表委员算笔账

我国军费正在恢复性增长

本报记者 付毅飞 高博

我国2015年国防预算增幅为10%左右的消息一经传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军费为何持续增长？用在了什么地方？今后会不会增长？

各种议论纷至沓来。对此，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委员给军费算了笔账。

“虽然去年增长了12.2%，今年又要增长10%，但我国军费还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尹卓表示，目前我国军费占GDP的1.5%，美国军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5%；美国的GDP是17.4万亿美元，我国约为10万亿美元左右。“我们的军费如果要达到美国的量级，意味着还要把现行军费翻五、六倍。在长期一段时间内，我国没有这样的能力。”他说。

他还表示，我国人口比美国多得多，平均每人承担的军费远比美国少；我国有200万军队，美国大约140万左右，军人均军费比我国高得多。如果与日本相比，虽然我国军费数量高出一倍以上，但军人均军费仅为日本的五、六分之一。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研究员陈舟代表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我国军费主要用在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以及装备费，三方

面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尹卓表示，越是现代化装备，价格越昂贵。“比如，上世纪50年代我们最好的战斗机大约15万元一架，现在战斗机的价格大概翻了1000倍左右；当年051驱逐舰每艘才几千万，现在的新型驱逐舰则超过20亿元。”他说。

同时他介绍，我国军人收入保持在略高于全民平均收入的水平。“让军人有体面的收入，会对稳定军心起很大作用。”他说，军人是风险性职业，即使在平时时期，急难险重的任务也由军人冲在第一线。另外，由于一些城市化问题，很多军人家属无法随军，尤其是基层干部两地分居现象非常普遍，合适的收入有助于稳定军队家庭的婚姻。“这是长期和平时时期我们应该给军人提供的条件。”他说。

针对有些西方媒体指责我国军费不透明，尹卓表示，我国发展航母、核潜艇等，虽然很费钱，但都在军费正常开支范围内，并没有超出军费另外拨款。他认为，各国有不同的军费管理方式。“比如美国有14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我们只有几艘；美国有50多艘攻击核潜艇，我们也只有几艘。美国的这么多核动力，

加上万余枚核弹头，是其国家能源部开支。美国的卫星全球最多，占世界卫星总数的60%到70%，还有过去的航天飞机、现在的X37B空天飞机，这些资金都是美国国家航天局提供的。美国的军人一旦退伍就推向社会，而我国大量离休、退休人员仍然靠军费养活。”他说，各国军费各有管理特色，不能说谁有意隐瞒。

尹卓认为，今后我国军费还会适当增长。“国防力量的发展要跟经济、科技增长成比例。”他表示，虽然近年军费建设达到了较大台阶，但要客观看待我国军事力量增长。“比如2013年，我国有20多艘舰艇下水，但满载排水量吨位只有七万多吨。”他说，美国同年下水的舰艇包括一艘福特级航母，排水量11万吨；两艘大型两栖攻击舰，合起来将近10万吨；两艘宙斯盾舰，共2万吨；两艘攻击型核潜艇，每艘排水量也达到8000吨。不算别的中小型舰艇，仅这些大型舰艇就达到20多万吨，大约是我国的四倍。“虽然我们的数量增长了，但在舰艇大型化、远海作战能力等方面远远不如美国。”他说。（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